

引用格式：

张改清, 景仕钊, 张建杰.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的富民效应[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5, 46(1): 141-154.

ZHANG G Q, JING S Z, ZHANG J J. The enrichment effect of the realization of village collective operational asset value[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5, 46(1): 141-154.

DOI: 10.13872/j.1000-0275.2024.1474

CSTR: 32240.14.1000.0275.2024.1474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的富民效应

张改清, 景仕钊, 张建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农业农村发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摘要: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推动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价值实现, 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和促进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为研究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物质和精神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本研究基于理论分析, 利用 2014—2018 年 CLDS 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价值实现显著提升农户的物质和精神富裕水平, 此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2) 这一价值实现通过增加就业机会和提升农户经营能力来提高物质富裕水平, 通过改善公共服务来提高精神富裕水平; 3)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物质和精神富裕的影响呈现显著的区域和个体异质性, 在沿海省份及高教育、高收入群体中对物质富裕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在沿海省份及低教育、高收入群体中对精神富裕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因此, 应盘活村集体经营性资产, 激发农村经济活力, 并根据村庄和农户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支农惠农政策, 以助力实现农户的共同富裕。

关键词: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 物质富裕; 精神富裕; 共同富裕; 双向固定效应

中图分类号: F32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275 (2025) 01-0141-14

The enrichment effect of the realization of village collective operational asset value

ZHANG Gaiqing, JING Shizhao, ZHANG Jianjie

(School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is an essential requirement of socialism.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village collective operating assets is a crucial measure to strengthen the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and enhanc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rural household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s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village collective operating assets on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prosperity of rural households, employing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the CLDS database from 2014 to 2018.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village collective operating assets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prosperity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valid after addressing endogeneity and conducting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2) This realization increases material prosperity by creating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of rural households, while it enhances spiritual prosperity by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s; 3) The impact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village collective operating assets on the material and spiritual well-being of rural households demonstrates significant regional and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with a more pronounced effect on material prosperity in coastal provinces and among high-education and high-income groups, and a more notable impact on spiritual prosperity in coastal provinces among low-education and high-income groups.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revitalize village collective operating assets,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formulate and implement supportive agricultural policies tailored to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villages and rural households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village collective operational asset value; material affluence; spiritual affluence; common prosperity; two-way fixed effect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理解和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现阶段,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层面的双层富裕。实现共同富裕, 最广泛的基础在农

收稿日期 Received: 2024-09-10; 接受日期 Accepted: 2024-10-08

基金项目: 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52400411209);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2024-JCZD-2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JY186); 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23SJGLX089Y)。Supported by Henan Province Soft Science Research Plan Project (252400411209); the Henan Provinci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Basic Research Major Project (2024-JCZD-22);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21BJY186); Research and Practice Project of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Reform in Henan Province (2023SJGLX089Y).

* 通信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 (hncyjz@126.com)

村,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户。因此,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与难点均为农户。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户的家庭资产水平明显偏低,而农户作为村集体成员共同拥有村级集体资产。这意味着,激活村集体资产,实现其资本化,加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并构建基于村集体资产的福利政策,可能成为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推动农户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径^[1]。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是村集体所拥有的资源或实体资产,能够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体现为村集体经济组织运用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创造经营性收入。在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村集体经济承担着“统”的作用,村集体资产的产权运营是置于“统分结合”下进行的。对于农户,通过明晰其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即可公平参与集体经营活动;基于对村集体资产的“共同共有”特性,将集体资产资源折股量化转变为村集体成员的“股份占有”,村集体成员被赋予对集体资产股份的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等六项权利,对村集体资产拥有了实质性控制权。据此,农户参与集体经营活动后获得的财产性收入,与其获得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相比,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2]。因此,利用“统”的发展思路助推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价值实现,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和促进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的研究。改革通过将集体资产量化为股份,实现了“归属清晰”,保障了农户的“剩余索取权”^[3],破除资产经营成本高企的“拥挤”问题,提高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经营效率^[4],助力农户提升收入。另外,改革会在其产生的股份激励、产业推动和劳动力流动等多重效应下形成对农户增收的稳定传递机制^[5]。第二,关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带动集体经济发展的研究。我国新型村集体经济市场主体建立,资产负债比有所下降,经营性收入占比逐步提高^[6],依靠明确的产权结构,借助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来促进当地集体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组织集体行动^[7],优化公共服务供给^[8]。第三,关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的共同富裕效应。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的实现不仅能够通过提供社会化服务、推动企业创新来促进村集体经济发展,还能有效降低农村基尼系数和个体收入剥夺系数,助推低收入村集体成员追赶高收入村集体成员,减少收入不平等,从而促进农户实现共同富裕^[9-11]。

已有研究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集体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角度切入,分析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在提高物质层面富裕水平的作用和影响。然而,鲜有文献将切入点放在精神层面,更未将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结合,剖析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综上,本研究旨在探究:1)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能否有效提升农户收入和幸福感,实现农户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共同富裕;2)其内在机制如何;3)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农户之间,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的富民效应是否存在差异。可能的潜在贡献如下:一是在研究理论方面,目前对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与农户物质富裕、精神富裕间关系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梳理了其内在联系和作用机理,为理论研究提供新的延伸。二是在实践意义方面,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背景出发,挖掘影响农户共同富裕背后的原因,对提高政策制定与实施精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从物质层面看,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可能会影响分红收入、就业机会、农户经营能力,提升农户物质富裕水平;从精神层面看,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可能会影响农户参与公共治理、公共服务,提升农户精神富裕水平。总体而言,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物质、精神层面存在不同的影响机制,能够有效提高农户物质、精神富裕水平,实现农户共同富裕目标。

1.1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物质富裕的影响

1.1.1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影响农户获得分红收入 提高村级资产经营产出是提高农户收入的有效方法^[12],其中大部分收入来源于股权分红。根据 2015—2018 年农业农村部(原农业部)统计数据,我国农村地区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超过 13 万个村组成功实施了改革,通过折股量化有效管理和分配村集体资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股份经济合作。从各省(区、市)的村集体经济资产管理条例中可以看出,村集体组织成员有权根据持有的股份获得集体收益,并参与年度利润分配。这一权利为广大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使其能够更直接地分享到村集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通过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农户手中的股权成为其获取稳定收入的重要来源。这种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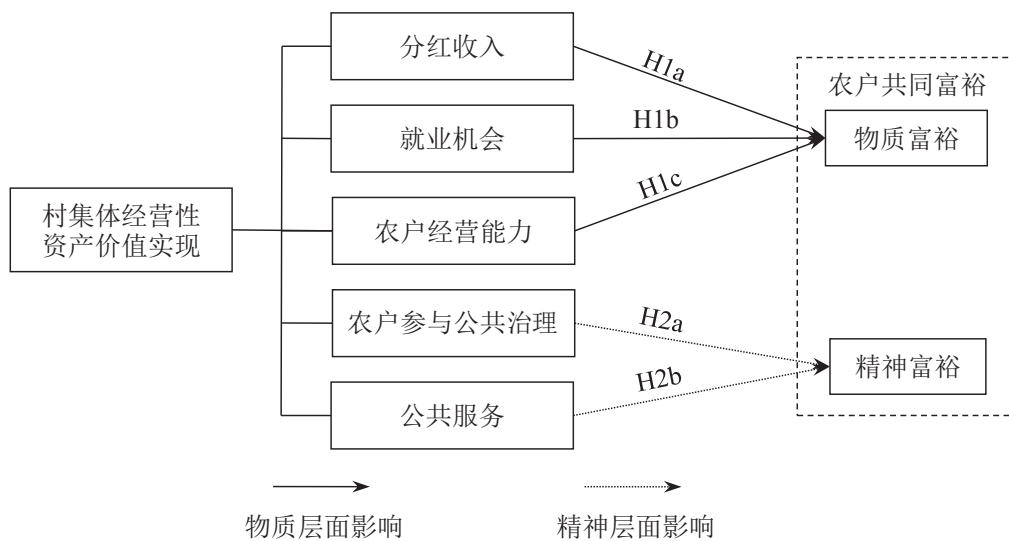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分析框架

Fig. 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不仅激发了农户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也为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的分红已经成为农户财产性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扩大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规模是提高农户收入的有效方法^[13]。农户通过持有集体资产收益分配股份获得的财富增长，主要得益于政府和当地的龙头企业：政府在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各类形式的项目中，只要农户持有股权，他们就能够依据自己持有的股权份额得到分红收入，这与村集体资产经营收益密切相关，成为农户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村集体还可以将经营性资产作为投资入股当地龙头企业，农户因此获得的企业利润分红，也将成为他们财产性收入的重要部分。此外，龙头企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强，使得村集体获得的企业分红收入较为稳定，农户凭借股权获得的分红收入也具有可持续性，为农户家庭收入增长提供了可靠保障。综上所述，随着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的实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作为村集体成员的农户分红收入也随之提高。

1.1.2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影响农户就业机会 农户在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过程中具有参与决策和获得就业的机会，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一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以租赁形式激活厂房、商住楼、仓储用房、养猪场、温室大棚等经营性资产，社会资本入村后，不仅能够带来村集体的租金收入，还能够带来社会资本对农村投资的跟随效应，促进农村产业的多元化和升级，由此为本地农户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14-15]；二是村集体经济组织凭借已有的经营性资产，自营承接各类涉农项目和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能够充分发挥其在发展村集体经济中的“统”功能^[16]，就近就地吸纳农村劳动力，实现本地化就业，提高农户生活质量^[17]，增强农村地区的经济活力和社会稳定性，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居间服务”作用，能够促进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增加就业的机会。

1.1.3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影响农户经营能力 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和经营素质是决定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拥有经营性资产的村集体，有能力为农户提供学习和实践的平台，从而提高他们自身的经营能力；此外，也能够助力农户进行创业，破除创业资源整合壁垒，推进共同富裕^[18]。村集体资产经营创造收益后，吸引来的入驻企业为农村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促进农户实现就业，优化农户“以地为生”的生计策略的同时，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规模化经营^[19]，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使农户在“干中学”中提升了生产经营能力；同时，政府、企业和村组联动的发展模式也为农户提供了更专业、更全面的发展，包括技术培训、市场信息共享等。另外，一些现代生产要素与经营理念^[20]，包括技术、设备、管理经验等通过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入村，能够有效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使农户不再受限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和手段，更高效地利用资源，提高生产效率，增强生产和经营能力，改善生产状况^[21]。农户有机会学习到创新的经营理念和技术，开拓新的收入来源，实现多元化经营。因此，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带动农户生产经营能力提升，对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具有积极影响。基于上

述分析, 提出如下假说:

H1: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可以提升农户的物质富裕水平。

H1a: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促使农户获得分红收入, 提升农户物质富裕水平。

H1b: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提升农户物质富裕水平。

H1c: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可以提高农户经营能力, 提升其物质富裕水平。

1.2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精神富裕的影响

1.2.1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影响农户参与公共治理 “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之一, 参与公共治理关系到农民的民主权利和利益表达, 关乎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22]。农户作为乡村振兴的基础力量, 需要扭转在决策和资源分配等方面话语权少, 参与频次低的状况, 否则会导致资源分配难以精准满足农村发展的实际需求, 进而造成农村发展规划与实践脱节, 甚至使既得利益被外部资本瓜分。在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实现进程中, 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成为农户提升精神层面富裕的重要途径。村集体通过股份制改革、评估规划资源、发展多元化产业和项目, 在实现经营性资产持续盈利的过程中,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切实感受到村集体经济壮大带来的好处, 通常会由“旁观者”变为“参与者”, 积极参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运营及公共治理^[23], 并且经济资源越多或利益关联越紧密, 参与公共治理可能性越高^[22]。根据社会认同理论,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这种心理归属, 会诱导自己主动参与村集体活动, 从而形成以心理归属为纽带的认同感^[24]。通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或监督, 农户实现了对村级公共事务的决策权, 增强了他们在社区中的归属感, 从而提升幸福感^[25]。此外, 由于认知偏差, 农户可能高估自己在参与公共治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26], 促使他们更加关注村庄的发展和利益,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进一步提升幸福感。由此, 农户的生产生活处在村庄网络之中, 行为逻辑不仅理性追求个人利益, 也寻求社会公平和群体认同, 参与公共治理对于他们的幸福感具有积极影响。

1.2.2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影响村庄公共服务 农户精神层面的富裕表现为其获得幸福感以及满足感的程度, 持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质量是提高人民生活福祉和幸福感的的重要方式^[27]。在实施乡村振兴的进程中, 农户幸福感的提升已不再局限

于衣食住行和安全保障等基本需求, 更多拓展到城乡差距缩小和基本公共服务短板的补齐^[28]。农村基础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与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提高其获得感。改善道路、桥梁、水电等农村基础设施, 能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优质的教育资源让农村孩子获得更好的成长机会; 健全的医疗服务保障了农户家庭的健康; 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充实了农户的精神世界等。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的提升, 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确保了农村居民的生产生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当前, 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尚未均等化的情形下, 村集体经济组织承担了部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29]。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 能够为村庄的基础设施建设、生产生活性社会服务以及其他公益事业等提供资金支持^[30-31]。不断优化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和质量, 能提供更好的生产生活条件, 减少农村城市发展差异, 推进共同富裕。因此,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带来的村庄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的改善, 将成为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基于上述观点, 本研究提出假说:

H2: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可以提升农户的精神富裕水平。

H2a: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可以促进农户参与公共治理, 提升其精神富裕水平。

H2b: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可以改善公共服务, 提升农户精神富裕水平。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为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 (CLDS)。CLDS 数据库样本规模大, 覆盖中国 28 省 (区、市) (不含港澳台地区、西藏、海南和新疆) 的劳动力, 具有全国代表性, 是目前公开可获得的、关于村集体经济领域相对较为全面且质量较高的数据库之一, 能够满足本文对村集体经济研究分析的多维度需求。CLDS 数据库调查样本包含三个层面: 个体、家庭和村庄。本研究在村庄层面将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为缺失值的样本剔除, 按照个体、家庭、村庄编码选取 2014—2018 年的数据构建面板数据, 形成新的数据集, 共获取全国 38 473 个农户样本。

2.2 变量选取与模型设定

2.2.1 被解释变量 物质层面富裕水平的被解释变量选取受访农户的家庭年收入。在 CLDS 数据库调查样本中, 家庭年收入包括全年的农、林、牧、副、

渔业的总体毛收入,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处理家庭年收入、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等收入变量指标时,常见的 $\ln(x+1)$ 变换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会引入干扰信息,且对于非正值的数据,该变换无法应用。因此,本研究对所有收入类变量使用反双曲正弦变换进行数据转换,即 $\ln(x+\sqrt{1+x^2})$ 。

精神层面富裕水平选取受访者幸福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在CLDS调查中,所涉及的问题为“受访者认为生活过得是否幸福”,幸福程度的评估基于李克特量表的五分法原则,评分从1分到5分递增。分数越高,反映出受访者的精神富足感越强。这一设计已被幸福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广泛采用,作为衡量个人福祉水平的关键指标。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选取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其与村集体经济的创收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密切相关,以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进行表征。当地的资源禀赋、政策环境、市场需求以及村集体的经营管理水平等,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如果收入稳定且持续增长,说明村集体经济具有较强的活力和发展潜力;反之,则可能需要调整策略以优化经营管理,从而提升村集体经济的实力和竞争力。尽管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其价值实现主要体现在村集体收益的增长上,因此以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作为表征。

2.2.3 控制变量 Cinelli等^[32]将控制变量分为好控制变量(good control)、中性控制变量(neutral control)和坏控制变量(bad control)三类,认为在实证分析中,控制变量的选取直接决定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在研究中应避开坏的控制变量。本研究选取县城政府距离、乡镇政府距离、财务信息公布频率、政务信息公布频率、村民委员会主任年龄、村民委员会主任户籍等对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同时存在影响的变量作为好控制变量。由于物质层面的被解释变量为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数量也会影响这一变量,因此添加家庭规模作为好控制变量。此外,本研究还选取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否党员、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与家庭特征作为仅影响农户物质与精神富裕程度的中性控制变量。

2.2.4 工具变量 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选取村集体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数量作为工具变量。在CLDS数据库中,村集体行政区域内的企业所有制包括村集体所有、私营企业、外资或合资企业及国营企业。由于土地用途受到严格限制,用于农业生

产的土地无法轻易转为他用,地理距离也会增加成本。因此,企业对农村投资,其资产的专用性极高。这意味着企业一旦投入资金和资源,就很难改变投资方向或转移资产用途,从而增加投资风险和不确定性。租赁经营性资产能够破解这一困境,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竞争力。村集体通过出租经营性资产,能够稳定地获得租金收入,增强集体经济实力,从而为农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村集体将资金投入企业也是直接创造村级资产经营收益的方式,因此行政区域内企业数量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满足相关性假设,而企业数量与农户家庭年收入、幸福感无直接关系,满足外生性假设,并在内生性检验中用工具变量近乎外生的处理方法进行检验。

2.2.5 机制变量 在农户分红方面,选取分红收入(即村里是否有分红或其他利益分配,受访者是否能分到)来验证分红情况。在就业机会方面,选取家庭工资性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及劳动变化来反映农户就业情况。在农户经营能力方面,选取家庭非农经营性收入来反映农户经营能力状况。在农户参与公共治理方面,选取农户的投票方式来反映其参与集体行动和公共治理的情况。在公共服务方面,参考李东平和田北海^[27]的研究,选取了涉及范围广且普惠性程度高的四种基本类型公共服务: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劳动就业和公共文体,根据其在村居规划范围内是否存在的情况,为村居赋予公共服务变量得分,来反映公共服务状况。本研究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2.2.6 模型设定 本研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由于受访农户所在的村庄类型和地理位置存在差异,且研究使用数据类型为间断短面板数据,因此,采用此模型不仅可以解决遗漏变量问题,还可以考虑到时间变化的因素。

$$y_{it} = \alpha + \beta_1 R_{it} + \beta_2 C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中: y_{it} 表示第*i*个个体在第*t*年的物质富裕、精神富裕; R_{it} 表示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 β_1 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 C_{it} 为一组控制变量, β_2 为对应控制变量的待估系数; μ_i 为地区固定效应,包括省份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和县域固定效应, λ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表示随机误差项, α 为常数项。

3 结果与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本研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地区固定效应中分别控制省份、城市和县域固定效应,以县级固

表 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物质富裕	受访者家庭年收入（反双曲正弦处理）	10.61	2.04
	精神富裕	受访者认为生活过的是否幸福：1=非常不幸福；2=比较不幸福；3=一般；4=比较幸福；5=非常幸福	3.72	0.91
核心解释变量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	村组统一经营收入（包括村集体企业上缴）（反双曲正弦处理）	0.97	2.12
控制变量	年龄 / 岁	实际年龄	44.45	14.77
	性别	男性 =1；女性 =0	0.49	0.50
	受教育程度 / 年	受访者受教育年限	2.82	1.67
	是否党员	是 =1；否 =0	0.05	0.21
	婚姻状况	已婚 =1；未婚 =0	0.87	0.34
	县城政府距离 / km	从本村出发到最近的县城政府所在地的距离	25.99	24.18
	乡镇政府距离 / km	从本村出发到最近的乡镇政府所在地的距离	6.33	20.16
	财务信息公布频率	公布财务信息的频率是：每季度两次及以上 =1；每季度一次及以下 =0	0.39	0.49
	政务信息公布频率	公布政务信息的频率是：每季度两次及以上 =1；每季度一次及以下 =0	0.47	0.50
	村民委员会主任年龄 / 岁	村民委员会主任年龄	48.86	8.43
	村民委员会主任户籍	村民委员会主任户籍是否在本村：本村 =1；非本村 =0	0.97	0.18
	家庭规模 / 人	受访者家庭人口数	4.46	2.31
	工具变量	企业数量 / 个	本行政区域内企业数量	8.93
机制变量	分红收入	村里有分红或其他利益分配，受访者是否能够分得到：是 =1；否 =0	0.46	0.50
	家庭工资性收入	受访者家庭工资性年收入（反双曲正弦处理）	5.58	5.54
	外出务工	受访者是否有外出务工：是 =1；否 =0	0.21	0.41
	家庭非农经营性收入	受访者家庭非农经营性（店铺 / 代销点 / 家庭作坊等）年收入（反双曲正弦处理）	1.37	3.63
	投票方式	受访者在村委会的选举中选择：自己去投票 =1；他人代投票 =0	0.57	0.50
	公共服务	村集体提供公共教育（行政区划范围内是否有小学：是 =1；否 =0）、医疗卫生（行政区划范围内是否有医院或私人诊所：是 =1；否 =0）、劳动就业（村子是否享受到农业生产技术培训服务：是 =1；否 =0）和公共文体（行政区划范围内是否有社区广场或公园：是 =1；否 =0）的分值之和	2.47	0.96

定效应为基准，对更高层次的未观测到的遗漏变量进行控制。如表 2（物质层面）和表 3（精神层面）所示，回归结果分别展示了关键解释变量、控制变量与年份固定效应对物质富裕（受访者家庭年收入）和精神富裕（受访者对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的影响。为控制可能存在的地区差异对结果的影响，在控制年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表 2（2）~（4）列和表 3（2）~（4）列分别控制省份、城市和县域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的富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种作用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也体现在精神层面。

在物质层面，如表 2（1）~（4）列所示，在单独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和控制年份及地区固定效应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可以显著提升农户的物质富裕水平，验证了假说 H1。盘活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唤醒“沉睡资源”有助于引导村集体更加重视经营性活动的开展，增强村集体经济的活力，通过合理规划和运营来增加集体收入，从而为提升农户收入创造更好的条件，推动乡村振兴。

在精神层面，表 3（1）~（4）列所示，在控

制年份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的基础上，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的精神富裕水平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回归系数分别在 1%、1%、5% 和 1% 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假说 H2。此结论为研究农户福祉和精神富裕提供了新的视角。引导资源合理流向能够增加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的领域，为提升农户幸福感奠定更坚实的经济基础。

3.2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3.2.1 内生性检验 本研究的内生性问题主要来源于互为因果和遗漏变量，这可能导致回归结果的偏差。首先，互为因果的关系中，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的增加可能通过多种途径提升农户收入，例如通过投资产业、提供就业机会或进行福利分配，直接或间接地增加农户的工资性、经营性或转移性收入。同时，生活水平较高的农户具备更强的市场意识和经济能力，能够更好地把握市场机会，自发成立各种形式的经济组织，如农户专业合作社，这些组织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推动农村经济多元化，进而提升集体经济收入水平。在精神层面，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的增长通常意味着农村经济良好

表 2 物质层面的基准回归
Table 2 Benchmark regression at the material plane

变量	物质富裕			
	(1)	(2)	(3)	(4)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	0.082*** (0.006)	0.060*** (0.006)	0.057*** (0.008)	0.059*** (0.008)
年龄	-0.021*** (0.001)	-0.022*** (0.001)	-0.020*** (0.001)	-0.020*** (0.001)
性别	-0.027 (0.024)	-0.020 (0.024)	-0.004 (0.024)	-0.005 (0.024)
受教育程度	0.121*** (0.009)	0.105*** (0.009)	0.086*** (0.009)	0.085*** (0.009)
是否党员	0.257*** (0.056)	0.253*** (0.056)	0.236*** (0.058)	0.249*** (0.057)
婚姻状况	0.613*** (0.043)	0.616*** (0.043)	0.569*** (0.045)	0.572*** (0.045)
县城政府距离	-0.004*** (0.005×10 ⁻¹)	-0.004*** (0.001)	-0.003*** (0.001)	-0.002* (0.001)
乡镇政府距离	0.001** (0.005×10 ⁻¹)	0.003*** (0.001)	0.002*** (0.001)	0.000 (0.001)
财务信息公开频率	0.058* (0.031)	0.041 (0.035)	0.000 (0.047)	-0.095* (0.052)
政务信息公开频率	0.054* (0.031)	0.094*** (0.031)	0.035 (0.038)	0.019 (0.040)
村民委员会主任年龄	0.003** (0.001)	0.001 (0.001)	-0.002 (0.002)	-0.005** (0.002)
村民委员会主任户籍	0.133** (0.067)	0.005 (0.070)	0.210** (0.089)	0.061 (0.097)
家庭规模	0.094*** (0.006)	0.083*** (0.006)	0.094*** (0.006)	0.097*** (0.006)
常数项	9.949*** (0.115)	11.248*** (0.243)	11.481*** (0.338)	11.813*** (0.344)
样本数	26 319	26 319	23 971	23 971
R ²	0.063	0.088	0.116	0.128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表同。

表 3 精神层面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at the spiritual plane

变量	精神富裕			
	(1)	(2)	(3)	(4)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	0.008*** (0.002)	0.010*** (0.003)	0.007** (0.003)	0.012*** (0.003)
年龄	-0.002*** (0.004×10 ⁻¹)	-0.002*** (0.004×10 ⁻¹)	-0.002*** (0.005×10 ⁻¹)	-0.002*** (0.005×10 ⁻¹)
性别	-0.041*** (0.010)	-0.044*** (0.010)	-0.042*** (0.010)	-0.042*** (0.010)
受教育程度	0.046*** (0.004)	0.047*** (0.004)	0.042*** (0.004)	0.041*** (0.004)
是否党员	0.226*** (0.024)	0.213*** (0.024)	0.213*** (0.025)	0.213*** (0.025)
婚姻状况	-0.019 (0.018)	-0.047** (0.018)	-0.033* (0.019)	-0.040** (0.019)
县城政府距离	-0.001*** (0.002×10 ⁻¹)	-0.001*** (0.002×10 ⁻¹)	-0.001 (0.004×10 ⁻¹)	-0.001 (0.004×10 ⁻¹)
乡镇政府距离	-0.001*** (0.002×10 ⁻¹)	-0.002×10 ⁻¹ (0.002×10 ⁻¹)	0.001×10 ⁻¹ (0.003×10 ⁻¹)	-0.002×10 ⁻¹ (0.003×10 ⁻¹)
财务信息公开频率	0.048*** (0.013)	0.046*** (0.014)	0.098*** (0.018)	0.058*** (0.020)
政务信息公开频率	0.008 (0.013)	0.006 (0.013)	0.010 (0.015)	0.009 (0.016)
村民委员会主任年龄	0.001 (0.001)	0.000 (0.001)	0.001 (0.001)	0.003*** (0.001)
村民委员会主任户籍	-0.046* (0.027)	-0.024 (0.028)	-0.021 (0.036)	0.008 (0.037)
常数项	3.673*** (0.047)	3.828*** (0.110)	3.726*** (0.157)	3.666*** (0.158)
样本数	33 232	33 232	30 633	30 633
R ²	0.021	0.055	0.080	0.088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城市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发展，增强农户对未来的积极预期，从而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幸福感高的农户更可能积极参与村集体事务，包括为经营性活动出谋划策、贡献劳动力和

拓展市场，这进一步促进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的增加。其次，遗漏变量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一些无法观测或无法度量的因素不仅影响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

价值实现程度，还会影响农户的福利水平。

本研究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以解决村集体经济性资产价值实现与农户富裕水平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回归结果见表 4，弱工具变量检验统计量为 426.85 和 89.79，远高于临界值，排除所选变量是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采用 Conley 等^[33]提出的工具变量近乎外生情况下的处理，将工具变量纳入基础模型得到估计系数 δ ，定义对称先验区间 $[-\delta, \delta]$ ，使用 UCI 方法进行检验，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关键解释变量的置信区间均未经过零点，说明即使放松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设，仍能得出与基准估计相同的结论。内生性检验结果在 1% 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回归结果的有效性。第二阶段回归的显著性水平为 1%，回归系数分别为 0.311 和 0.267，表明对农户富裕提升的显著正向作用，原结论得到确认。

3.2.2 稳健性检验 基于物质富裕和精神富裕的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见表 5。首先，更换回归模型进行检验：在物质层面，由于被解释变量物质富裕的下限为零，若忽略零值的归并，可能会导致回归结果的偏误。因此，在控制县域固定效应的基础上，采用 T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T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关键解释变量在 1% 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在精神层面，考虑到

因变量为有序分类变量，采用有序 Logit 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有序 Logit 回归的估计结果，关键变量在 1% 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

其次，改变样本量进行检验：近年来，学界对 P-hacking 行为的关注日益增加^[34]。P-hacking 行为指通过操纵数据或反复试验等手段以获取显著性结果，而非真实揭示数据之间的关系。为提高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随机剔除原样本量的 20% 并再次进行回归，以排除 P-hacking 行为的干扰。表 5 显示，关键解释变量对物质富裕的回归在 1% 水平上显著，系数为 0.064；在精神层面，其显著性水平为 5%，系数为 0.010。经过稳健性检验后，原结论依然成立，表明结果的稳健性良好。

3.3 村集体经济性资产价值实现富民效应的机制分析

3.3.1 农户分红收入 关于农户是否能够获得分红收入，根据表 6 (1)、(2) 的结果，仅在控制年份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关键解释变量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加入县域固定效应后，未观察到正向影响，假说 H1a 未能得到验证。可能的原因在于：当前，大多数村庄的集体经济仍处于起步阶段，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经营性收入作为集体经济的关键来源之一，通常承担着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责任，因此需要用于扩大再生产。在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支出构成中，公益支出通常占据主要部分。农村

表 4 内生性检验
Table 4 Endogeneity test

变量	内生性：物质层面		内生性：精神层面	
	村集体经济性资产价值实现	物质富裕	村集体经济性资产价值实现	精神富裕
村集体经济性资产价值实现		0.311*** (0.107)		0.267*** (0.092)
企业数量	0.011*** (0.001)		0.005*** (0.00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村庄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弱工具变量检验	426.85		89.79	
不可识别检验	425.62***		90.50***	
内生性检验	8.351***		9.239***	
UCI 估计	[0.020, 0.651]		[0.002, 0.034]	
样本数	32 262		33 192	

表 5 稳健性检验
Table 5 Robustness test

变量	更换回归模型		改变样本量	
	物质富裕	精神富裕	物质富裕	精神富裕
村集体经济性资产价值实现	0.059*** (0.008)	0.025*** (0.008)	0.064*** (0.009)	0.010** (0.00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数	23 971	30 633	23 831	19 277

表 6 机制检验：农户分红收入
Table 6 Mechanism test: property income

变量	分红收入	
	地区未控制	地区控制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	0.010** (0.004)	-0.019*** (0.006)
常数项	-0.219*** (0.077)	0.534 (0.46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未控制	已控制
样本数	4 261	3 909

地区在多个方面对公共资源的需求迫切，例如，为了改善村民的出行条件，需要投入资金修建和维护道路；为保障村民的身体健康，必须建设和完善医疗设施；而为了让农村孩子接受良好教育，兴建和改进学校等教育设施也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公益事业的推进都依赖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支持，包括用于购置先进的生产设备、引进新技术或开发新的产业项目，以增强集体经济的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真正落实经营性收入分红的村庄数量相对较少。即使在已经实施分红的村庄，分红收入的水平也普遍较低。这意味着，大多数农户从集体经济的发展中直接获得的经济回报依然有限，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成果在惠及广大农户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3.2 就业机会 表 7 验证了假说 H1b。在 (1) 和 (2) 列中，单独控制时间固定效应，以及控制时间和县域固定效应的情况下，家庭工资性收入的回归系数显著受到关键解释变量的正向影响。尽管一些

学者认为农户的劳动收入增长已达到难以突破的上限^[35]，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悲观。随着产业在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的推动下，开始向多产融合的方向发展，“沉睡资源”被激活，从而形成了结构化、系统化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还促进了产业链的延伸和价值的提升^[36]，为工资性收入的持续增长注入了新活力。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多元化的职业选择，农户能够在更广阔的产业领域中找到工作，获取稳定且有望增长的工资收入。表 7 (3) 列显示，在受访者选择外出务工的决策中，关键解释变量的系数为负，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村级资产经营产出增加可能促使居民留在本地，享受更多就业机会，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随着本地就业机会的增加，村民不必再远离家乡寻找工作，这大大减少了村庄劳动力的外流现象，从而保持了社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3.3.3 农户经营能力 表 8 (1) 列显示，随着村级资产经营收益的增加，家庭非农经营收入显著提高。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水平的提升，使资源能够更有效地整合和调配，为农户家庭提供更好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支持，从而促进其经营效益的提升。此外，村集体通过经营性活动发展相关产业，也能带动农户参与其中，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和经营渠道。例如，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农户可以依托此进行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从而提升其经营能力，假说 H1c 成立。

表 7 机制检验：就业机会
Table 7 Mechanism test: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变量	家庭工资性收入		外出务工
	地区未控制	县域控制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	0.243*** (0.016)	0.056** (0.023)	-0.091*** (0.017)
常数项	1.788*** (0.325)	8.178*** (0.934)	-2.573*** (0.89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未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样本数	26 530	24 159	20 772

表 8 机制检验：农户经营能力、农户参与公共治理、公共服务
Table 8 Mechanism test: the ability of farmers to operate,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governance, public services

变量	家庭非农经营收入	投票方式	公共服务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	0.054*** (0.016)	-0.001 (0.002)	0.026*** (0.003)
常数项	1.826*** (0.666)	1.397*** (0.048)	0.637*** (0.12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县域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数	24 281	30 083	30 593

3.3.4 农户参与公共治理 在农户参与公共治理方面,表 8(2)列的结果显示投票方式没有受到关键解释变量的影响,农户在投票时并没有更多选择自己进行投票以参与公共事务,假说 H2a 不成立。可能的原因包括:一是村级资产经营产出水平低,能够用于激励农户参与公共事务的资源相对较少;二是缺乏与农户参与公共事务挂钩的明确激励措施,导致农户缺乏动力;三是公共决策机制不够完善和透明,尽管村集体有一定的经营性收入,但决策过程缺乏民主参与的渠道和规范流程,村民的意见和建议无法有效传达和采纳,降低了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宣传和教育工作的不足也可能是一个因素。

3.3.5 公共服务 从表 8(3)列的回归结果看,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的增加能够为公共服务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用于改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直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而良好的公共服务水平又能反过来吸引更多资源和投资,以及外部专业人才参与公共服务的提供和管理,形成良性循环。这种循环不仅提升了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也为农户创造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生活条件,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幸福感,有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农村社会,假说 H2b 得到了验证。

3.4 异质性分析

为探究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富裕程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或个体异质性,本研究将样本依据所在省份的地理位置分为沿海和内陆两组进行区域分组回归;同时依据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进行个体分组回归。在年龄方面,将大于等于 50 岁的样本归为高年龄组,小于 50 岁的为低年龄组;在教育方面,将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样本归为高教育组,初中及以下的归为

低教育组;在收入方面,将个人年收入大于等于 3 万元的样本归为高收入组,低于 3 万元的归为低收入组。

3.4.1 区域异质性 区域异质性的估计结果如表 9 所示。结果表明,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富裕程度的提升具有一定的空间差异性。物质层面上,内陆和沿海地区的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均能显著促进农户富裕程度,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结果显著,组间系数存在可比性,沿海地区的回归系数更大。精神层面上,沿海地区的关键解释变量系数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内陆的变量系数则不显著, 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结果显示经验 P 值为 0.010。可能的原因在于,村集体资源和政策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村集体经济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最早在沿海地区启动,并逐步推广至内陆。这一改革的实施方式因地制宜,呈现多样化特点。在某些地区,改革采取以个人为单位的股权确权方式,即每位村民根据对集体资产的贡献获得相应股份;而在另一些地区,则选择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确权,家庭成员共同持有股份,共享集体资产收益。在沿海地区,许多村庄在十多年前就已完成改革,而在内陆地区,改革推行仍处于初期阶段。政策效用的差异导致农户满意度和富裕程度的偏差。

3.4.2 个体异质性 在年龄差异方面(表 10),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高年龄农户和低年龄农户的物质富裕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 0.083 和 0.082,差异较小。然而,对高年龄农户的精神层面并未显示显著影响,反观年轻农户因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的提升而感受到更高的幸福感。可能的原因在于,村集体经济的增长通常伴随着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年轻人更容易参与这些经济活动,并愿意接受新事物,对新技术和商业模式

表 9 异质性分析:内陆与沿海
Table 9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land and coastal

变量	物质富裕		精神富裕	
	内陆	沿海	内陆	沿海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	0.034*** (0.012)	0.078*** (0.008)	0.003 (0.005)	0.012*** (0.00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项	11.393*** (0.271)	9.895*** (0.290)	3.701*** (0.117)	4.442*** (0.127)
经验 P 值	< 0.001		0.010	
R^2	0.056	0.089	0.051	0.062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数	14 338	11 981	18 184	15 048

注:经验 P 值采用 Fisher's Permutation Test。

表 10 异质性分析：个体年龄
Table 10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vidual age

变量	物质富裕		精神富裕	
	高年龄	低年龄	高年龄	低年龄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	0.083*** (0.010)	0.082*** (0.006)	0.007 (0.004)	0.010*** (0.003)
常数项	11.524*** (0.289)	10.080*** (0.119)	3.043*** (-0.116)	3.816*** (0.060)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²	0.037	0.046	0.056	0.089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数	13 392	18 910	13 782	19 450

具有更强的适应性，这帮助他们在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中获益并提升幸福感。相对而言，老年人因年龄和健康原因，参与度可能较低。

在教育差异方面（表 11），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高教育农户和低教育农户的物质富裕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高教育农户的精神富裕未显示正向影响。高学历农户通常具备更强的管理能力和更广泛的社会资源，能够把握村集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更多资源和合作机会，从而提高物质富裕程度。而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户可能更容易适应经济变革和政策变化，他们更能直接感受到集体经济带来的好处，因此会感到更加满意和幸福。相较之下，高教育农户的基本需求已得到满足，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提升对他们的幸福感未产生显著作用。

在收入差异方面（表 12），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和高收入和低收入农户的物质富裕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在精神层面，其对高收入农户的影响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低收入农户未

显示正向影响。可能的原因是：高收入和低收入农户的幸福感主要受到收入水平的直接影响，村集体经济的增长可能集中在某些特定项目或个体上，而没有惠及到所有的低收入农户；另外，有些内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集体经济的增长可能加剧了这种差距，使得低收入农户受益有限。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1) 通过“统”的发展思路推动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显著提高农户的收入和幸福感，进而提升其物质和精神富裕水平，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2) 就业机会和农户经营能力是提升农户物质富裕水平的两条路径：“沉睡资源”的激活促进了产业链延伸和价值链提升，为农户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工资性收入，减少了劳动力外流；村级资产经营收益的增加为农户家庭经营提供了更优质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支持，显著提高了非农经营

表 11 异质性分析：个体教育
Table 11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vidual education

变量	物质富裕		精神富裕	
	高教育	低教育	高教育	低教育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	0.095*** (0.010)	0.079*** (0.006)	-0.001 (0.005)	0.011*** (0.003)
常数项	10.733*** (0.223)	10.221*** (0.123)	4.098*** (0.109)	3.495*** (0.055)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²	0.063	0.043	0.022	0.015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数	5 245	27 057	5 436	27 796

表 12 异质性分析：个体收入
Table 12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ndividual income

变量	物质富裕		精神富裕	
	高收入	低收入	高收入	低收入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	0.081*** (0.008)	0.069*** (0.008)	0.007** (0.003)	0.005 (0.004)
常数项	10.456*** (0.153)	10.483*** (0.143)	3.687*** (0.064)	3.539*** (0.071)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R ²	0.052	0.05	0.024	0.016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数	15 519	16 783	16 115	17 117

收入。

3)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能够为公共服务提供更多的资金来源, 直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从而为农户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 增强其幸福感。

4)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对农户物质和精神富裕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和个体异质性, 具体表现为: 物质富裕层面在沿海省份的村庄以及高教育和高收入群体中效果更显著; 精神富裕层面则在沿海省份的村庄以及低教育和高收入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4.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下一阶段推动农户实现共同富裕应着重从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增加技能培训和公共服务投入、优化政策体系, 加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等方面入手:

第一, 继续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符合农村实际需要的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开展包括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林权等在内的流转交易; 推广股份制改革, 将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份或份额形式量化到集体成员; 鼓励村民以多种形式参与集体资产的经营和管理, 通过租赁经营等方式, 让村民直接参与到集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第二, 增加技能培训和公共服务投入。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充分发挥其“居间服务”的功能, 为农户提供更多技能培训和政策支持, 提升农户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 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入, 改善基础设施, 提高教育、医疗、交通等服务的质量和覆盖面, 如建设文化广场, 完善医疗设备配备,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等。

第三, 优化政策体系, 加强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立足各地区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条件特征, 因地制宜建立并完善促进其价值实现的政策体系, 切实增进农户物质与精神的同步富裕, 确保政策措施能够精准惠及相应农户群体, 统筹发挥好富民政策制度的系统支撑作用; 各村按照自身发展特点, 通过清查核实集体资产, 明确资产权属, 登记资产台账, 编制资产负债表, 份额(股份)登记簿和建立成员名册等方法壮大集体经济; 利用信息化手段, 如建立网络群聊、服务平台等, 在保障成员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前提下, 提高集体资产管理的透明度, 推动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的高水平实现。

参考文献:

[1] 钟文晶, 罗必良. 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的资产逻辑[J]. 学术月刊, 2022, 54(11): 38-53.
ZHONG W J, LUO B L. The asset logic of farmers moving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J]. Academic Monthly, 2022, 54(11):

38-53.

- [2] 张红宇, 胡振通, 胡凌啸.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探索: 基于 4 省份 24 个村(社区)的调查[J]. 改革, 2020(8): 5-17.
ZHANG H Y, HU Z T, HU L X.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 system: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24 villages(communities) in 4 provinces[J]. Reform, 2020(8): 5-17.
- [3] 张浩, 冯淑怡, 曲福田. “权释”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理论逻辑和案例证据[J]. 管理世界, 2021, 37(2): 81-94, 106, 7.
ZHANG H, FENG S Y, QU F T.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and case evide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2021, 37(2): 81-94, 106, 7.
- [4] 秦国庆, 杜宝瑞, 马九杰. 股份制改革与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治理绩效[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4, 44(3): 17-32.
QIN G Q, DU B R, MA J J.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 reform and the governance performance of rural collective-operated assets[J]. Economic Theor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2024, 44(3): 17-32.
- [5] 孙琳琳, 吕德宏, 张雨. 农村集体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基于陕西省 1051 户样本数据的估计[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3, 44(2): 274-284.
SUN L L, LU D H, ZHANG Y. The impacts of rural collective land joint-stock cooperative system reform on farmers' income: estimation based on a survey data of 1051 farmers in Shaanxi Province[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3, 44(2): 274-284.
- [6] 陈全功, 徐念.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现代化发展探讨[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7): 1-9.
CHEN Q G, XU N. Discussion on the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J].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4(7): 1-9.
- [7] 曹银山. 新型集体经济必然助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吗? 基于“竞争性-共享性”的理论框架[J]. 当代经济管理, 2024, 46(5): 63-72.
CAO Y S. Will the new type of collective economy inevitably boost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mpetition-sharing”[J]. Contemporary Economic Management, 2024, 46(5): 63-72.
- [8] 张立, 王亚华.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 以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7): 44-64.
ZHANG L, WANG Y H. How does village collective economy affect village collective Action? Evidence from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vision of rural irrigation facilitie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1(7): 44-64.
- [9] 穆娜娜, 孔祥智, 卢洋啸. 新时代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创新研究: 以江西绿能公司为例[J]. 科学管理研究, 2020, 38(4): 98-105.
MU N N, KONG X Z, LU Y X. Study on innovation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services' pattern in China of new era: based on Jiangxi Lvneng corporation[J]. Scientific Management Research, 2020, 38(4): 98-105.
- [10] 张衡, 穆月英. 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价值实现的农户增收和追赶效应: 外生推动与内生发展[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8): 37-59.

- ZHANG H, MU Y Y. Farmer income growth and catch-up effect of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of rural collective operating assets: exogenous promotion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23(8): 37-59.
- [11] 罗必良, 耿鹏鹏. 农村集体经济: 农民共同富裕的实践逻辑[J]. *社会科学战线*, 2024(6): 54-73, 281.
- LUO B L, GENG P P.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e practical logic of farmers' common prosperity[J]. *Social Science Front*, 2024(6): 54-73, 281.
- [12] 黄季焜, 李康立, 王晓兵, 等. 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产权改革: 现状、进程及影响[J]. *农村经济*, 2019(12): 1-10.
- HUANG J K, LI K L, WANG X B, et al. Reform of property rights of rural collective-operated assets: situation, process, and its impact[J]. *Rural Economy*, 2019(12): 1-10.
- [13] 夏英, 张瑞涛.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创新逻辑、行为特征及改革效能[J]. *经济纵横*, 2020(7): 59-66.
- XIA Y, ZHANG R T. Reform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innovative logic,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form effectiveness[J].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2020(7): 59-66.
- [14] 邵俊杰, 周力, 胡凌啸. 工商资本下乡能促进农户增收吗?[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4(2): 123-134.
- SHAO J J, ZHOU L, HU L X. Does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flowing to rural areas increase rural household income?[J]. *Journal of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2024(2): 123-134.
- [15] 罗明忠, 魏滨辉.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85-99, 206.
- LUO M Z, WEI B H. The impact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reform on county-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4(2): 85-99, 206.
- [16] 夏柱智.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点[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1(2): 22-30.
- XIA Z Z.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emphasi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1, 21(2): 22-30.
- [17] 徐忠国, 卓跃飞, 陈阳, 等. 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多主体行为逻辑: 以杭州临安为案例[J]. *中国土地科学*, 2024, 38(1): 105-113.
- XU Z G, ZHUO Y F, CHEN Y, et al. Multiple behavioral logics in the redevelopment of idl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 case study of Lin'an, Hangzhou[J]. *China Land Science*, 2024, 38(1): 105-113.
- [18] 闫善涛, 马国巍, 刘畅. 产业振兴背景下农户创业的驱动因素研究: 兼析农村集体经济助力农户创业的作用机理[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4(3): 132-137.
- YAN S T, MA G W, LIU C. Study on the driving factors of entrepreneurship among farmers in the context of 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with an analysis of the assistance role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es[J]. *Price (Theory & Practice)*, 2024(3): 132-137.
- [19] 王永平, 张舒甜.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4, 23(3): 273-282.
- WANG Y P, ZHANG S T. Impact of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development on farmers' income gap: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RRS data[J].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4, 23(3): 273-282.
- [20] 高鸣, 李桢然, 雷泽. 人才支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模式探索、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22, 43(4): 568-577.
- GAO M, LI Z R, LEI Z. Talent supporting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mode exploration, realistic dilemma, and optimization path[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22, 43(4): 568-577.
- [21] 杨希双, 罗建文.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9(3): 261-274.
- YANG X S, LUO J W. Research on the subjectivity of farmers based on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ower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3, 29(3): 261-274.
- [22] 罗必良, 吕姝颖. 农民幸福感: 来自村庄选举投票的证据[J]. *学术研究*, 2022(7): 91-97.
- LUO B L, LÜ S Y. Farmers' happiness: evidence from village election voting[J]. *Academic Research*, 2022(7): 91-97.
- [23] 秦国庆, 贾小虎, 马恒运. 股份合作制改革推动了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共享共治吗?[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2, 21(5): 564-572.
- QIN G Q, JIA X H, MA H Y. Can shareholding cooperative reform promote inclusiveness and co-governance of rural collective productive assets?[J].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22, 21(5): 564-572.
- [24] 范志雄, 徐辉. 集体经济内源式发展的逻辑表征: 以甘肃省W村为例[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2(4): 9-16.
- FAN Z X, XU H. 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collective economy: a case of W village in Gansu Province[J]. *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2, 22(4): 9-16.
- [25] 倪志良, 张开志. 公共转移支付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吗: 基于微观参与行为与受益程度的解释[J]. *现代经济探讨*, 2020(6): 1-14.
- NI Z L, ZHANG K Z. Does public transfer payment increase residents' happiness: explanation based on micro participation behavior and benefit degree[J]. *Modern Economic Research*, 2020(6): 1-14.
- [26] QUATTRONE G A, TVERSKY A. Contrasting r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analyses of political choice[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8, 82(3): 719-736.
- [27] 李东平, 田北海. 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如何影响农户获得感: 基于湖北省1036个农户样本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24(1): 22-44.
- LI D P, TIAN B H. How does the Accessibility to basic public services affect rural households' sense of gain?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1036 rural households from Hubei Province[J]. *China Rural Survey*, 2024(1): 22-44.
- [28] 徐亚东, 张应良.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优化: 基于需求度和满意度的IPA分析[J]. *农村经济*, 2024(5): 110-121.
- XU Y D, ZHANG Y L. Optimization of basic rural public services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livable, workable and beautiful villages: IPA analysis based on demand and satisfaction[J]. *Rural Economy*, 2024(5): 110-121.

- [29] 栾健, 张哲晰. 兼顾效率与公平: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 经济学家, 2024(1): 118-128.
LUAN J, ZHANG Z X. Balancing efficiency and equ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farmers and rural areas[J]. Economist, 2024(1): 118-128.
- [30] 郁建兴. 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 发展历程、社会政策与体制机制[J]. 学术月刊, 2011, 43(3): 5-17.
YU J X. China's public service system: developments of social policy, institution and mechanism[J]. Academic Monthly, 2011, 43(3): 5-17.
- [31] 梁晨.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4(4): 22-32.
LIANG C.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service syste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func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4, 24(4): 22-32.
- [32] CINELLI C, FORNEY A, PEARL J. A crash course in good and bad controls[J].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024, 53(3): 1071-1104.
- [33] CONLEY T G, HANSEN C B, ROSSI P E. Plausibly exogenously[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2, 94(1): 260-272.
- [34] BRODEUR A, COOK N, HEYES A. Methods matter: P-hacking and publication bias in causal analysis in economic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0, 110(11): 3634-3660.
- [35] 孙敏. 城乡关系视域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践类型及其运作逻辑[J]. 社会科学, 2024(3): 153-165.
SUN M. The practical types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rural relations[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4(3): 153-165.
- [36] 张新文, 杜永康. 集体经济引领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样态、经验透视与创新路径: 基于江苏“共同富裕百村实践”的乡村建设经验[J]. 经济学家, 2022(6): 88-97.
ZHANG X W, DU Y K. Collective economy leads the practice pattern, experience perspective and innovation path of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100 villages practice” in Jiangsu Province[J]. Economist, 2022(6): 88-97.

(责任编辑: 孟岑)